

学校校庆之后,有个高三学生转来她写的一篇感想,对学校校庆期间的一些现象作出评论。我看了很感奋,为学校有这种独立思考的学生感到欣慰。真正有价值的教育,就是要把学生教得超过老师,非此也不足谓“名校”。次日,忍不住把她的文章转给老同事老朋友看,大家都很激动。钱理群教授回信说:“令人感动。学校能有这样的学生,正说明教育的成功。不过,这样的学生也许不会太多。”校长回信说:“这位学生很真诚,学生爱学校,才会这样写。”一位老教师说:“看这篇文章时眼泪涌了出来,当时不知道是她写的。这么些年,那么多困难,我之所以不离开讲台,就是想到学校有这些可爱的学生……”

一名中学生,当他有“思想”的意识之时,当他开始有理性的批判与怀疑精神时,他才会有充实的内心,才会有对探索的热爱,他才能始终充满活力,他才会真正认识到世界的美妙。关注社会,从关注身边的事物开始。学生在学校受教育,他所受的教育是否正确,他是否有追尋事物真相的愿望,老师能否提供他发表独立见解的机会,学校能否建设自由言论的环境,都非常重要。学生不言从,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,是对教师的信任,值得

肯定。我更感兴趣的,是学生有属于个人的见解。

曾有个校长在晨会上说:“虽然炸油条也算一种职业,但是我们学校毕竟不是培养炸油条的。”事后有学生郑重其事地问:“老师,请问,你是否同意这句话?”我听后他的情绪,反问他:“你听出什么‘意思’了?”学生说:“校长说话的口气,表

让学生自由地思想

王栋生

现出对炸油条这个职业的鄙夷;但是,炸油条是正当的职业,是劳动;作为学校校长,在公开场合向全校说这样的话,是对劳动的侮辱。”我再问:“那么,你认为学校应当培养学生什么呢?”学生说:“学校要培养学生的自尊,培养对劳动的尊重;至于学生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,并不重要。”我很想告诉他:校长说那样的话,是教育的不幸,也是社会的不幸;但学校有你这样能独立思考的学生,这个社会还有希望。因为你不但能敏锐地发现问题,而且有自己的见解。在场的学生有两千多人,究竟有多少人听了校长的话会感到不舒服呢?现场也有两百多位教职工,他们也认同校长的教

育观吗?这真是个问题。

有学校心血来潮,建“园林化校园”,以为有情趣。学生对校园建设有没有自己的看法?我问过学生,很多学生不感兴趣,视而不见;有的说开始感到新奇,但几千人在校园活动,弄成小桥流水,极为不便,“看三天就索然无味,却要在这里呆三年”,“没有了活动的空间,设计理念错误”。20年前,有学生反对学校种“观赏草”,他在作文中写道:“老校友说‘最怀念冬日,躺在大草坪上晒太阳’,令人神往。校园不大,有点空地还要养‘观赏草’,不准学生进去,这才叫‘不国情’呢。”“如果种普通的草,冬天的中午,我就能躺在中心草坪上晒太阳了,那才叫有情调!”——我赞同他的意见。城市校园一般不大,种“观赏草”,学生就没地方去了——学生作为学校的“过客”,提点意见,无人理睬,只能在作文里宣泄一下,这总可以吧?谁如果想“管”学生的思想,起码要有超过学生的智慧,倘若不如,则说为佳。

教师有可能犯错误,校长未必有智慧,学校教的一切不一定可靠……如果学生敢于这样思维,是教育的幸事,作为教育者,要有博大的胸襟,让学生自由地思想。



随想随说



天籁祥音 (中国画)

樊明龙

差不多每个人在童年时代都阅读过《快乐王子》和《白雪公主》的童话,人们往往欣赏故事中王子的英勇顽强和公主的美丽善良,但人们从不奢望王子和公主能转换角色,主动为孩子们写童话。这在旧时代是幻想,而在当今世界却成为现实。

少儿社早在1983年和1985年就分别出版过两本泰国诗琳通公主的小说《顽皮透顶的盖珥》和《淘气过人的盖珥》;1986年又出版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童话《纳加湖畔的老人》;2002年推出日本美智子皇后的作品《架桥——童年阅读的回忆》。通过这些作品中译本的出版,我们向民众打开了了解国外皇室的窗户。

中泰两国地理相连,文化相通。泰国的诗琳通公主是一位曾经获得金质奖章的历史学士和文学学士。她热爱中华文化并经常访问中国,2005年起,她在泰国开办的“公主学校”设立中文班,吸收学员近千名,在泰国掀起“中国文化热”。

1982年,我社收到文化部对外驻泰使节郭宣颖的来信,准备翻译泰国公主诗琳通的小说《顽皮透顶的盖珥》,并想约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作序。当时的社长陈向明非常高兴,陈伯吹先生也不顾年事已高,挥笔作序:“闪光美妙的画卷”。诗琳通公主本人更是为中文版的出版亲笔撰写了中文前言。结果此书于1983年以中国当时最好的纸张和印刷工艺投入生产,首版5000册,样书50册送对外文化联络局转交诗琳通公主。媒介评论此书的出版体现了中国童

书印制的最高水平。

在这之后的一、两年,本社再度出版了诗琳通公主的第二部作品《淘气过人的盖珥》。此书同样以儿童生活气息浓厚和装帧精良而受到好评。

1983年,本社编辑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看到了介绍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童话《纳加湖畔的老人》的文章,便托人在伦敦买到这本书。大家研究后觉得不

错,于是请吴美龄女士翻译,陈伯吹先生作序“彩笔下的神奇幻境”。1986年8月,查尔斯王子的童

书《纳加湖畔的老人》中译本3000册,以精装和平装两种形式出版了。这部书原是王子写给自己兄弟的,因为写得出色,才为世人所知晓和赞扬。

2001年7月,旅日作家唐亚明先生访问本社,谈及日本皇后美智子在第26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新德里大会上的主题发言《儿童读物带来和平》颇具影响,于是洽谈版权贸易、商量合作出版等具体事宜在紧锣密鼓中展开,唐亚明先生的译稿也顺利完成,取名《架桥——童年阅读的回忆》。美智子皇后还特为中文本的出版,精选个人照片供中文版使用。此书的出版为中日儿童文学交流增添了友好篇章。

60年来本社以文化使者的角色,在儿童出版领域搭建一座中外交流的彩桥,而这么多多年前的美好记忆也将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脑海里。

小时候,曾只知“文人”,不知“人文”。

十目谈

永葆天真

小时候,曾只知“文人”,不知“人文”。

剧种的宝贵财富

要意义,人们至今还在进行研讨。

任何戏曲艺术的变革都要得到观众的支持才算成功。在处理变革与观众的关系上,重要的是处理好变革与老观众的关系。

老观众是剧种的知音和宝贵财富。对老观众要尊重,要引导,两者缺一不可。一个地方剧种的诞生是以人们的心血所凝成,又是老观众所养育,剧种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传统也是观、演双方共同培养的,被老观众所珍惜是当然的。所以撇开老观众单方面变革剧种艺术既有悖于情理,也无意于变革本身。

把老观众当作变革的参与者,当作变革的镜子,倾听他们的意见,随时检查变革的力度和进度是否适当,是我们应取的态度。即使老观众出于保守的原因一时抵制某些变革,也应当耐心地引导和等待,只要变得好,他们迟早会接受。

当年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就很重视老观众,带动老观众一同前进。她的方法是一个新编戏中不断地作些革新,让老观众逐渐适应新的变化,改错了的必定改回来,取得老观众的信任。渐进和积累符合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规律。结果不仅留住了老观众,而且争取了大批新观众。这条经验值得注意。

剧种的艺术变革也要处理好与新观众的关系。新观众大多是青年,他们是剧种的未来。黑发人不进剧场是剧种的一大忧患。

徐玉兰、竺水招、张桂凤、徐天红、吴小楼一批年轻演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明星和剧种的代表人物。”对越剧改革的丰富内容和重要意义,人们至今还在进行研讨。

任何戏曲艺术的变革都要得到观众的支持才算成功。在处理变革与观众的关系上,重要的是处理好变革与老观众的关系。

1981年下半年,我与正文兄先后进入正在筹备复刊的新民晚报。从此,我们的命运和新民晚报紧紧连在了一起。弹指一挥间,我和正文做了整整31年的同事。

据说正文进晚报是有一点争议的。因为当时他已小有名气,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,报社领导怕他来了以后不安心新闻工作。记得我进报社时,也听老同志们讲过,如果你想当作家,就不要进来。一开始我并不十分理解,后来才慢慢明白,做新闻工作,是要有牺牲精神的。当记者,时刻要准备去第一线采写新闻;做编辑,则要甘坐冷板凳,为他人做嫁衣裳。如果你自己想搞创作,势必与之发生矛盾,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

但正文最终还是如愿进了晚报,不知他当时有没有做过什么保证。

正文进报社后,先是在政法部当记者。印象比较深的是,1985年,当时开始重视培养青年干部,上海新闻界也提拔了一批年轻人。正文为之感到欢欣,写了热情洋溢的报道,并因此与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赵启正同志结下了友谊。

1986年晚报第一次扩版(6版扩为8版),当时报社采取“招标”的办法,正文主动请缨编辑“读书乐”专版,试刊成功后,一编就是22年。在“读书乐”专版创办1000期时,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撰文赞道:“读书乐”专版挺立二十年,真是“庭中有奇树,绿叶发华滋。”他觉得“读书乐”成功之处在于:一是内容的普及,二是文章的短小,三是联系的周到。这其中包括同读者的联系、与作者的联系。他风趣地说道:“对我这样一个懒作者,米舒(正文的笔名)都不嫌弃,信函电话,频频联系。逢年过节,还寄贺卡,真是周到,使我愧受。米舒无意间为‘读书乐’专版积聚了一笔无形的资产,谓之敬业,谓之努力,皆可。”

因为编“读书乐”,正文接触了许多名家,读了更多的书,有了更多的知识积累,他的创作热情因此迸发。其实,晚报一直是鼓励编辑记者多写文章的,只不过希望大家不做作家当杂家。受此影响,文

虑,他们不爱看越剧的原因是越剧不投合他们的欣赏趣味——他们的欣赏趣味与前辈相比已有所变化。我们要正视青年艺术欣赏的要求,以此作为变革的动因。但是夸大审美的变异性,忽略审美的继承性,至少是片面的观点。审美的继承性是审美活动的基础。谁能相信今天青年和老年的审美观是截然相反的?所以青年不爱看越剧还有另一个原因——他们不了解越剧。

包括越剧在内的中国戏曲艺术不同于再现生活原貌的话剧,它们对生活作了提炼、变形,最大的特点是有程式,所以欣赏戏曲要有一副戏曲的耳和目。戏曲观众是需要培养的。如今的青年很少看越剧,没接受过培养,成了不

戏曲观众。过岁的孩子经常出入戏园子,耳濡目染,不爱戏曲也难。现在环境变了,不利于这样做了,就得采取另外的培养方式,如借助于影视传播,在中小学开设戏曲音乐课等。培养观众要下大功夫。要是我们不去做这项艰苦的工作,见青年不会欣赏越剧曲调,就把“曲”改成“歌”,见青年不会欣赏越剧程式,就把越剧改成音乐剧,如此这般,终难长久,也算不得对青年负责。

正文的写作也深深地打上了晚报的烙印,短小精悍,以小见大。他一篇一篇地写,然后集腋成裘。如今他的新书《米舒说千古文人》即将出版,真是为他感到高兴,同时也钦佩他持之以恒的勤奋。

正文告诉我,他的文史知识,受益于章伯恒先生。1978年至1981年三年中,他每周去章先生家听课,在章先生指导下读《二十四史》,写下了不少读书札记。近年来,在这基础上他又加以整理,补充新的内容,提出新的见解,陆续在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上发表。因工作关系,我得先睹为快,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印象:

一、他评点的历史文人,大多是大家熟悉的,但发掘的史料却不大为人所知,即所谓“熟人生事”。如沈括是古代杰出科学家,但其人品之瑕,一直为后人所忽视。又如张居正,他一直被正面歌颂,但其人品亦有可议之处。

二、对一些过去较少被评论的历史人物,选择一个角度,展开议论。如孔范之谏,李东阳之忍,董其昌之霸……让读者看到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侧面。

三、每篇文章都在一千字左右,娓娓道来,有故事,有细节,有观点,有评论,可读性强。

四、所选人物,上至先秦下到清代,从这些古代知识分子身上看到封建社会的烙印和他们的局限性,同时也折射出他们的优点、弱点及其觉醒。

作为一家之言,正文的文章刊登后,也有一些读者来信提出商榷,这说明他的文章有人看。这样的互动,也增强了报纸的影响力。正文对待读者的意见是认真的,凡言之成理的,都虚心接纳,在出版时作了修正。

正文的成功,在于他继承了晚报老一辈报人的好传统,为读者而写,笔耕不辍。如今,当面对新进报社的年轻人时,我想对他们说:“如果你选择新闻事业,那么,你手中的笔永远不要停下。”

(本文为《壶中书影——米舒说千古文人》序)

电影《一九四二》再现了当年河南特大饥荒的悲惨实况。由此,笔者不禁联想到昔日宋庆龄深切关怀难民的情景。

1943年初春,中原灾情进一步恶化,国民党政府却仍无动于衷,而且还企图隐瞒。重庆《大公报》毅然登载了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和社评,蒋介石竟下令将该报停刊三天。广大群众非常愤怒,强烈要求“赈济豫灾”。寓居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的宋庆龄闻讯,立即指示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(简称保盟)立刻行动起来,通过举办座谈会、街头演讲等形式开展募捐活动。她为了发动更多人参与赈灾,根据爱好体育的保盟中央委员许乃波的提议,决定出面组织国际足球义赛。

随即,宋庆龄与中华体育协会重庆分会取得联系,商定以该会名义筹备国际足球义赛;还宴请相关国家的大使,争取给予支持。

宋庆龄发出举行国际足球义赛的倡议后,山城各界人士热烈响应。经过协调,中国方面很快诞生两支足球劲旅:重庆的体育健儿踊跃报名,组成“东平队”;各地足球名将很快由沪赴渝,组成“沪星队”。至于外国方面,则由英国驻华使馆及军事代表团的体育爱好者等组成“英联队”,由韩国在华青年组成“韩青队”。

5月3日下午,重庆两路口川东师范学校(今重庆文化宫所在地)人如潮涌,盛况空前。宋庆龄为国际足球义赛主持开幕式,她在讲话中向全体嘉宾和观众介绍了河南灾情,号召各界人士投入赈灾;接着,她由英国驻华大使陪同,健步走到赛场中央,热忱地与各参赛队的运动员握手,并亲自为球赛开球。“沪星队”与“东平队”首场球赛,经过激烈的角逐,“沪星队”以五比三获胜。

5月15日下午,国际足球义赛继续开赛,观众把赛场围得水泄不通。宋庆龄不顾连日来忙于赈灾的疲劳,拨冗前来助阵。这天,第一场球赛是“东平队”对“韩青队”,“东平队”以八比一获胜;第二场球赛是“沪星队”对“英联队”,“沪星队”以九比三获胜。翌日下午又举行了两场球赛,场内观众逾万人。苏联驻华大使及英国军事代表团要员等都观摩了球赛。

国际足球义赛总共踢了三轮五场,最终“沪星队”以强大阵容夺取冠军,同胞们无不为此扬眉吐气,欢欣鼓舞。在闭幕式上,宋庆龄、重庆市长贺耀祖和英国驻华大使等向各参赛队赠送奖旗,并向每位运动员颁发特制纪念章。这次特别的球赛吸引了海内外观众两万余人,募得的大量捐款均汇给设于陕西宝鸡的“豫灾救济委员会”。

特别的球赛

朱少伟

